

朱子学研究丛书

顾问 高令印 主编 乐爱国

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

ZHUZI GEWU ZHIZHLUN YANJIU

乐爱国 著



顾问 高令印 主编 乐爱国

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

乐爱国 著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乐爱国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0

ISBN 978 - 7 - 80761 - 279 - 7

I. 朱... II. 乐... III. ①程朱学派—哲学思想—研究 IV. B24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7085 号

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

作 者: 乐爱国

责任编辑: 管巧灵

封面设计: 吴颖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65 千字

ISBN 978 - 7 - 80761 - 279 - 7/B · 51

定价: 28.00 元

承印: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朱子学研究丛书》序

高令印

朱子与孔子是后先相继的两位文化巨人。北宋后期，基于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过渡，文化落后的金人又将灭宋，承担不了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重心由北方的中原往南方转移，儒佛道诸种形态都聚焦于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朱子在武夷山五十多年，进一步以儒学为主干，融合佛道之学，建立起完整严密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新的国家文化重心——武夷文化。朱子拨千年之乱而反正，把中国文化的主导权从佛道那里夺过来，使中国文化返本归位，重新树立起中国主体文化意识——儒家思想的正宗地位。我很赞赏清人张伯行为明朱衡《道南源委》所作“序”中的一段话：

至考亭朱子、勉斋黄氏，师弟之授受，朋友之讲习，奋然兴起者，如云汉之昭回，如江河之莫御。理学名区，独盛于闽，不惟比拟伊洛，直与并称邹鲁。而程子“道南”之一语，遂符合如左券。噫嘻！闽滨东海，屹立武夷诸名胜，元气融液，人与地会。……吾见闽学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

2 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

澎湃。

朱子学于宋末元初，由南至北而全国，成为国家的正宗思想；东传至日韩等国，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日本岛虔次语）；于近代又传入西方，成为世界性的学说。朱子学的这种南北东西的传播，是极其深刻的国际性的中国文化运动。

朱子思想体大蕴深，是中国文化的综合体。由于孔子以及与孔子有关的儒家典籍，大都经过朱子整理注释过，研究孔子思想，实际上是研究朱子的孔子思想。因此，朱子学的研究范围至为广泛。当前，国内外对朱子本身的研究已十分深入，高质量的成果层出不穷，显示朱子学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必须开辟出朱子学研究的新领域。乐爱国教授主编的这套《朱子学研究丛书》，大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立论，如朱子与闽学、朱子学与徽学、朱子与格物致知等，扩大了朱子学研究的范围。

鉴于朱子学的一些研究成果缺乏可读性和普及性，作者群即读者群，在原著的范围内兜圈子，不能充分表达朱子学的文化价值；本丛书强调从文化的意义上研究朱子学，力图用解释的方式代替阐述学。文化是以文教化，是国家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和衣食住行一样须臾不可离。朱子学是“为己之学”，“内圣外王”，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丛书的作者们，努力发掘朱子学中的现代意义价值，继往开来，从中寻找出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任何文化思想，都有传统和时代两个方面。时代依附传统，传统也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只有将传统和时代结合起来，文化才能发展。朱子思想所赖以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时代已经消失，其许多具体学术主张和思想观点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其笃实务实、道德观念、开放摄取精神，不仅存在于其著述中，

更主要的是仍稳固地凝聚于历代中华民族的心理中，包括现代，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在个体和群体的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发掘朱子学中的现代价值，是朱子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愿这套丛书的作者们，再接再厉，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为朱子学的研究开创出更高的境界。

2009年5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朱子格致论形成的学术背景	(9)
一、早期格致思想的发展	(10)
二、二程及其门人的格致思想	(15)
三、朱子师友的格致思想	(35)
四、余论	(51)
第二章 朱子格致论建构的心路历程	(53)
一、格致思想的酝酿	(53)
二、格致思想的形成	(65)
三、格致思想的完善	(73)
四、格致思想的阐扬	(88)
五、余论	(97)
第三章 格致论与朱子理学的出发点	(101)
一、格物致知：《大学》第一义	(103)
二、格致论与理气论	(110)
三、格致论与心性论	(116)
四、格致论与理欲论	(122)
五、余论	(126)
第四章 朱子格致论的理论内涵	(128)
一、“即物而穷其理”	(128)

2 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

二、“格物所以致知”	(143)
三、“物格而后知至”	(148)
四、物格知至“入于圣贤之域”	(167)
五、余论	(178)
第五章 朱子的格致论与科学研究	(182)
一、科学的研究的缘由	(184)
二、科学的研究的途径和方法	(199)
三、科学思想与成就	(215)
四、对自然知识的传播	(226)
五、余论	(237)
第六章 朱子门人及后学的格致论	(239)
一、朱子门人的格致论	(239)
二、真德秀、魏了翁的格致论	(253)
三、金华朱子学的格致论	(265)
四、黄震、王应麟、吴澄的格致论	(275)
五、余论	(285)
第七章 朱子格致论的演变与格致学	(288)
一、格致论在明代的演变	(288)
二、格致论与传统科学的发展	(295)
三、西方科学的传入与“格致学”	(301)
四、余论	(305)
结语：从朱子的格致论接着讲	(307)
一、格致论是朱子理学的出发点	(307)
二、朱子格致论是知识论的表述	(310)
三、朱子格致论是对儒家知识论的建构	(314)
四、如何接着朱子的格致论讲	(317)
主要参考文献	(320)

引言

——研究的意义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①，朱子一生于“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②）最为着力，成就《四书章句

① 钱穆的《朱子学提纲》有“朱子为集儒学之大成者”一节，其中述“朱子之集理学之大成”（参见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1~23页）。冯友兰也指出：“朱子之学，可谓集其以前道学家之大成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4页）陈荣捷的《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指出：“朱子之集大成，约有三端，即新儒家哲学之发展与完成，新儒学传受道统之建立，以及《论》《孟》《学》《庸》之集合为四子书。”（陈荣捷：《朱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然而，牟宗三则认为，朱子“不是儒家之大宗，而是‘别子为宗’”（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9页）。蔡仁厚也说：“在义理系统与工夫入路上，朱子只继承伊川一人，并不真能集北宋‘理学’之大成。其实，朱子的伟大，亦不在集什么之大成，而在于他思想一贯，能独力完成一个义理系统。”（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第二版，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185页）

② 现在通行的“四书”次序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但按照朱子思想，该次序应当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朱子曾明确指出：“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四，中华书局，1985年，第249页）

2 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

集注》，而以其中《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最能代表他的思想，且对后世影响最大。

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最初可以追溯到《大学》，并且直接来源于二程（程颢、程颐）^①。朱子曾经说过：“格物之说，程子论之详矣，而其所谓‘格，至也，格物而至于物，则物理尽’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②在他看来，二程的格物致知思想已经相当周详。然而，他又认为，二程的格物致知思想在后来的传承中并没有得到准确而完整的表述，甚至发生了某些偏差，而他所要做的正是在于重新阐扬和完备二程的格物致知之说，以延续《大学》的格物致知思想。朱子指出：

这个道理，自孔孟既没，便无人理会得。只有韩文公（韩愈）曾说来，又只说到正心、诚意，而遗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广其说，工夫精密，无复遗憾。然程子既没，诸门人说得便差，都说从别处去，与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曾精晓得程子之说耳。只有五峰（胡宏）说得精，其病犹如此。亦缘当时诸公所闻于程子者语意不全，或只闻一时之语，或只闻得一边，所以其说多差。后来却是集诸家语录，凑起众说，此段工夫方始浑全。^③

所以，朱子格致论的建构，既是对于二程之后各种有关格物致知

^① 冯友兰认为，程颢与程颐的思想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虽然他们在表面上没有形成两派，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程颢的思想成为心学，程颐的思想成为理学（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0~121页）。但是，编订了二程著作的朱子，并不对程颢与程颐作出区别，而通称“程子”。这至少说明，在朱子看来，程颢与程颐的思想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二），《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③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八，第421~422页。

思想的检讨和综合，又是对于二程格致论的重新阐释、发挥和完备。

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①，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②。应当说，在朱子的学术生涯中，格物致知思想的酝酿、形成、完善和阐扬贯穿于始终。在这一过程中，朱子很早就提出圣门之学“始于格物以致其知”，并且进一步认为，格致功夫在于积久贯通。后来，通过对二程“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诠释，朱子进一步提出了“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经历了长期的酝酿，于淳熙初年（1174年前后）大致形成；淳熙十六年（1189），《大学章句》与《大学或问》的完成标志着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达到成熟。此后的十余年，朱子以阐扬其格物致知思想为主要的学术工作。自十五六岁时读《大学》，直至临终前几天改《大学》“诚意章”，可见《大学》对于朱子学术之重要。应当说，正是在诠释《大学》、构建格致论的过程中，朱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下学而上达”、“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理学体系。

朱子的格致论是为了解决当时有关如何穷理的问题而建构起来的。从格致论出发，朱子探讨了理气问题、心性问题、理欲问题等，从而构建了他的整个理学体系。朱子的格致论讲“即物而穷其理”，这就必须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为逻辑前提，因而就要涉及理气问题。朱子的“理一分殊”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更多的是要求人们“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

^①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上》，中华书局，1986年，第1495页。

^②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上》，第1504页。

其当然”，因而明显具有“格物致知”的内涵。在朱子那里，格物的主体是人，并且格物的目的在于复归于人的本心，即所谓“明明德”，这就需要讨论“心”、“性”、“情”及其相互关系。而且，朱子的“格物致知”最终是为了达到诚意、正心、修身，“入于圣贤之域”，并进而在力行中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理欲关系等诸多问题。

因此，朱子的理学思想大致是围绕着“格物致知”而展开的。更为重要的是，朱子不仅从“格物致知”出发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且对如何“格物致知”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探讨了格物的对象、途径、方法等诸多问题，要求通过持敬、学问思辨、推类、积累与贯通，达到“物格而后知至”，这就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格物致知论。由此可以看出，格致论不仅是朱子一生学术历程的主线，实际上也是朱子整个理学体系的出发点。

除了传注儒家经典、建构格致论乃至整个理学体系，朱子还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对自然界事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他提出的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天有九重以及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大地表面升降变化的规律等，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朱子的科学研究是在其格物致知的框架中进行的，他的格致论是理解其从事科学研究的关键之所在。

朱子“即物而穷其理”的格致论，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影响重大，诚如钱穆所说：“朱子思想，以论格物穷理为最受后人之重视，亦最为后人所争论。”^① 它不仅为朱子门人以及后学所继

^① 钱穆：《朱子新学案》（中），巴蜀书社，1986年，第707页。

承，而且导引出诸多格物致知的解说者^①。他们对于朱子的格致论，既有阐扬，亦有责难，尤以明代的王阳明最为著名。王阳明认为，朱子的“即物而穷其理”，是“外心以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因而把“格物”诠释为“格心”，把“致知”诠释为“致良知”，并且还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②然而，即使在阳明学盛行之时，也还有罗钦顺讲“就天地万物上讲求其理”^③；更有明末东林学派以为“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④；王夫之则在继承朱子“即物而穷其理”思想的同时，更多地主张通过“质测”，即自然科学研究，进行格物，指出：“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⑤为得之。”^⑥纵观朱子之后的学术发展可以看出，朱子的格致论实际上开启了后世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向。

朱子的格致论，不仅对于儒学的发展，而且对于当时科学的

^① 明末刘宗周曾言：“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明刘宗周：《大学杂言》，《刘宗周全集》第一册，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7年，第771页）

^② （明）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③ （明）罗钦顺：《困知记》附录《答欧阳少司成崇一》，中华书局，1990年，第122页。

^④ 《高子遗书》卷八上《答顾泾阳先生论格物》（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

^⑤ 关于“质测”，与王夫之同时代的方以智指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蟲蠧，类其性情，征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明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可见，方以智所谓的“质测”，就是指自然科学研究。

^⑥ （明）王夫之：《搔首问》，《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岳麓书社，1992年，第637页。

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①。在朱子那里，格物致知包括了格自然界事物，实际上包含了对于自然界事物的研究。不仅朱子自己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展开了对于天文、地理等诸多领域的研究，而且朱子后学以及后世不少儒家学者，乃至许多科学家，都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展开对于自然界事物的研究，从而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明中叶之后，西方科学开始进入中国。徐光启把西方科学归于“格物穷理之学”名下。清中期之后，许多与西方科学有关的著作都冠以“格致”的书名，而且西方科学被称做“格致学”，直至最终出现了“科学”概念。从“格致”到“科学”概念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朱子的格致论所开启的。

尤为重要的是，朱子的格致论对于整个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创新性的意义。孔子以“仁”开创了儒学，并强调“仁”与“知”的统一。然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儒家的“仁”学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心性学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而“知”学却一直融合于“仁”学之中，且发展较为薄弱。朱子的格致论虽然没有能够明确地把“知”学从“仁”学中分离出来，但其具有显著的“知”学倾向，并发展了儒家的“知”学。对此，钱穆在所著《朱子学提纲》之“朱子论格物”一节中指出：“朱子论心学工夫最要着意所在，则为致知。悬举知识之追寻一项，奉为心学主要工夫，此在宋元明三代理学诸家中，实惟朱子一人为然。欲求致知，则在格物。就理学家一般意见言，心属内，为本；物属外，为末。理学家所重之理，尤在心性方面。心

^① 中国科学史家席泽宗指出：宋代新儒学“追求理性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无疑有推动科学发展的作用。宋元科学高峰期的出现，这是一个因素”（席泽宗：《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性之理，则贵反求而自得。朱子不然，认为内外本末，须一以贯之，精粗具到，统体兼尽。此为朱子在一般理学思想中之最独特亦最伟大处。故朱子不仅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实欲自此开出理学之新趋。”^① 据此亦可推知，朱子的格致论实际上开启了儒家知识论的新途径。

对于朱子理学的研究，已有不少重要的学术著作问世，这无疑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以往的这些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囿于某种定式，而且主要是从本体论（或理气论）出发，进而探讨朱子的心性论、认识论（或格致论）、理欲论等。依据某种定式，通过分门别类的方法，以求获得对于朱子思想的把握，固然是一种研究方法。但是，运用这种分门别类的方法，去研究尚没有明确分门别类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不仅其“合法性”尚待论证，而且难免有肢解研究对象之嫌。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这种研究方式所重构起来的从理气论出发并带出心性论、格致论、理欲论的体系，并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朱子以格致论为核心并以之为出发点的思想结构体系，而且也与朱子终生致力于《大学》诠释、构建格致论的学术心路历程不相吻合。

朱子的格致论早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除了钱穆称朱子格致论“为最受后人之重视，亦最为后人所争论”，“为朱子在一般理学思想中之最独特亦最伟大处”，胡适认为，朱子的格物致知是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这是“程朱一派的特别贡献”^②。陈荣捷也认为，朱子的

① 钱穆：《朱子学提纲》，第 122 页。

② 胡适：《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91 年，第 1102 页。

8 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

格致论“为影响中国思想甚大而为后人攻击甚力者”^①。任继愈则指出：“朱熹创立的‘格物说’丰富了中国哲学史，它成功地把天下万物众理归结为一个天理，众物之表里精粗（关于自然、社会、历史之理）与人类的全体认识过程的认识范围融合为一体。这个理既有自然之理（物理），也有人心之理（伦理），从而构成了相当完整的哲学体系。”^②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格物论是“朱子学体系的重要理论特征”^③；朱子思想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格物致知’论”^④。笔者也曾撰文，称朱子的思想体系“以格物致知论最为重要，且最有影响”^⑤。然而，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格致论在朱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确认，因而也没有能够出现专门论述朱子格致论或从格致论出发阐述朱子思想的学术专著。

本书所述，不是把朱子的格致论看做从本体论派生出来，也不只是把朱子格致论看做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依据朱子一生学术思想的心路历程，通过具体分析朱子思想体系中格致论与其他思想的关系，确立格致论作为朱子思想体系出发点的地位，进而详细阐述朱子格致论的思想结构及其传承和影响，突出朱子格致论在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确证钱穆所谓“朱子全部学术，即是其格物穷理之学”^⑥。

① 陈荣捷：《朱熹》，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81~82页。

② 任继愈：《朱熹格物说的历史意义》，《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3页。

③ 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0页。

④ 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

⑤ 乐爱国、高令印：《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历史作用》，《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54页。

⑥ 钱穆：《朱子学提纲》，第206页。

第一章 朱子格致论形成的学术背景

“格物致知”概念源出于《大学》。自西汉时期《大学》编入《礼记》并被确立为儒家经典之后，历代都有经学家对“格物致知”作出各自的解说。宋代儒家尤为重视《大学》。先是有司马光著《大学广义》^①，二程甚至移易《大学》古本^②，并对其中的“格物致知”作出了解说，从而成为朱子格物致知思想的直接来源。此外，二程的门人、朱子的师友对于“格物致知”的解说，也构成了朱子格致论形成的学术背景。

-
- ① 清人朱彝尊指出：“取《大学》于《戴记》讲说而专行之，实自温公（司马光）始。”（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五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徐复观也说：“宋司马光作《大学广义》一卷，及《致知在格物论》一篇，而《大学》始有单行本。”（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页）
- ② 参见《河南程氏经说》卷五《明道先生改正大学》、《伊川先生改正大学》，《二程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126～1132页。